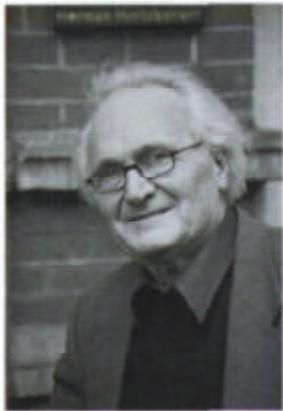


短长书：给赫尔曼·赫茨伯格的10个问题

A SHORT CONVERSATION: TEN QUESTIONS TO HERMAN HERTZBERGER

赫尔曼·赫茨伯格, 朱亦民 / Herman Hertzberger, ZHU Yimin



赫尔曼·赫茨伯格 (Herman Hertzberger), 被认为是荷兰建筑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曾设计过大量居住及教学建筑, 曾作为《论坛》杂志的编辑, 并且是贝尔拉格学院的创始人及第一任院长(以下简称H)。朱亦民 (ZHU Yimin), 现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以下简称Z)。

Z: 你在26岁时赢得了竞赛并把它建了起来, 这是你作为建筑师职业生涯的开始。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那个时候你的同辈人当中有许多都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建造了他们的第一个作品, 比如说佩特·布罗姆(Piet Blom)在他们是学生时就赢得了项目并建成了它。可否请你更多介绍一下1960年代早期建筑界的情况?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阿尔多·范·艾克的?

H: 在经历了1960年代早期一段只讲数量的建设时期之后, 我被阿尔多·范·艾克邀请加入《论坛》杂志的编委会, 这本杂志成为一个无出其右的批评平台。这个圈子成为我大学之后继续建筑思考的起点。

Z: 大家都知道在1960年代范·艾克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一些老师如卡雷尔·韦伯有过争执。他们之间主要的分歧在什么地方? 能否描述一下你和范·艾克及其他《论坛》的同道一起工作的岁月?

H: 卡雷尔·韦伯直到1970年代才出现, 他代表了轻视建筑的作用的那一派, 那种精确又或许有些隐晦的方式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那时韦伯的信条“城市是第一位的”与范·艾克关注特定形式的结构的想法产生矛盾。范·艾克认为建筑和城市是一根棍子的两端, 在逃离了范·艾克的影响之后, 实际上我们后来意识到韦伯更接近我对结构和填充物之间所做的结构性的区分。

Z: 1960年代激进文化对你有何影响? 你参加过什么激进运动吗?

H: 1960年代激进运动曾经是令人激动、充满活力的, 但我的方法较少是政治性的, 而更多关于人类学。

Z: 就我们所知, 有几个对荷兰结构主义来说是灵感来源的设计: 勒·柯布西耶的威尼斯医院、路易·康的理查德医学研究楼、史密森夫妇的城市改造方案以及日本新陈代谢派的作品。你认为哪一个是影响最大的?

H: 现在应该要把关注结构配置的方法和结构性的思考区分开。它们可能初看上去很相像, 但实际彼此相反。如果我曾受到过什么影响的话, 肯定是日本新陈代谢派和康, 而不是佩特·布罗姆。勒·柯布西耶的威尼斯医院受到了佩特·布罗姆方案的影响, 布罗姆的方案在十次小组的罗那蒙特会议上展出过。

Z: 在1967年你只有35岁时开始了毕希尔中心办公楼的设计。你是如何得到这个项目委托的? 业主从一开始就支持你的想法吗?

H: 我的业主只是对周围那些平庸乏味的办公楼感到厌倦了, 他只想要些不一样的东西, 自然他转向了更年轻的一代。我向他展示的想法和他的原则——仅仅是组织方式上的——很一致。

Z: 你是少有的几个在1980年代坚持不懈地反对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建筑师, 为此你曾遭到查尔斯·詹克斯的攻击。但我们仍能看到一些在后现代主义的语义学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相似想法。是什么驱使你反对这场后现代的狂热浪潮?

H: 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 我厌恶那种愚蠢的向后看的想法。除了很少几个让人遗憾的例外, 我一直站在现代主义这一边。这就意味着对一种语言的信仰, 这种语言表达了民主、技术进步, 当然还有空间的概念。

Z: 阿尔多·范·艾克的理论产生自一种反现代主义的观点, 他尤其反对其功能主义的教条和城市规划的策略。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理念使城市的重建走向了死胡同, 制造了一种不人道和无法居住的环境。因此他建议用“意义”和“地方”的概念来代替“空间”这个奠定了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的概念。作为范·艾克最早的追随者和合作者之一, 你看起来持相反的观点, 正如你在《空间与建筑师》这本书中所表现的, 你坚持一种以空间概念为基础的认识论。你认为这是你和范·艾克之间不一致的地方吗? 你怎么解读它?

H: 你是对的。我在对他的力量保持尊敬的同时慢慢脱离了他, 去找我自己的路, 我对新的影响持开放的态度, 而不是仅仅强调地方这一概念, 我认为空间和地方是一个辩证的平衡的两极。

Z: 很明显雷姆·库哈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和最流行的建筑名星。在他的《小、中、大、超大》一

书中, 他批评结构主义的方法, 说这样的一种操作导致了城市里的建筑的趋同——“从赫尔曼·赫茨伯格受到喝采的分成了小的单元结构的毕希尔中心办公楼开始, 这种模式已枯竭和瓦解到了极端衰弱的地步, 它要为其所引发的可识别性的极端混乱负责。今天的孤儿院、宿舍、住宅、办公楼、监狱、百货商店和音乐厅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小、中、大、超大》, p287)。你怎么回应这一批评? 你又如何评价他的城市理论和建筑实践的策略?

H: 雷姆的“反应”是很典型的(如果不说是通常)下一代人对之前一代人的反应。实际上他在一次我们之间的聊天当中承认他并不反对毕希尔办公楼, 而是反对模仿它的那些建筑。顺便说一句, 和他的“恶梦”不同, 这些建筑其实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

简单地说, 我的方法是: “设计强而有力/持久的结构, 吸引/容纳时空中的多样性”, 这和他可能希望是那个样子的信条相去并不远。

实际上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雷姆对比他年轻的一代的影响正在变成另一个错觉和花招, 比如超大尺度的悬挑、斜的柱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拭目以待下一代人。

Z: 你怎么看待从维尔·阿雷兹、MVRDV到NL建筑师等更年轻一代人的作品? 当前荷兰建筑中潜在的主要危机是什么?

H: 如果能降低业主去搞他们所认为的实验的欲望, 现在的荷兰建筑就没有什么(潜在的)危机。你所提及的“年轻人”仍在搞漂亮的房子。只是城市空间仅仅成了一块舞台布景, 注意力被放在松散、相互没有联系并只考虑它们自己的物体上。

Z: 贝尔拉格学院成立之初遇到了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急剧变化。你作为贝尔拉格学院的创办者和第一任院长目睹了所谓由“左”向“右”的转向。你怎么看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和1990年代它对建筑和教育的影响?

H: 自我离开了贝尔拉格学院以后, 一种“互联网后现代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它导致了快(餐)式的建筑, 奇怪的是它还很可以吃, 就是说它很好看但缺乏任何意义: 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我不害怕全球化, 而是害怕“有内容的形式”被“徒有其表的形式”所代替。另一方面, 我现在陷入一种对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的学校的强烈渴望——如果不说是饥渴当中。这样的学校不是仅仅装备了教室, 而更多是基于计算机辅助的更为个性化的教育。未来学校的空间条件涉及建筑的意义, 而这正是我尝试加以实践的东西。我正在准备的新书是关于这方面问题的。当然, 学校是唯一还没有被商业利益所腐蚀的建筑。



1 赫尔曼·赫茨伯格(摄影/Photo: Mgoop Luimes)
2,3 赫茨伯格事务所内景